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夏史

郭
泳
著

大禹之子启创建了以传子制度为标志的『中华第一朝』——夏。作为『天下共主』的夏王传十四世、十七王，绵延四百七十一年。中华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始于夏代。古人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是中华文明的开局王朝，留给后世的是：夏历、夏礼以及青铜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主编 李学勤 郭志坤

夏史

郭

泳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史/郭泳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李学勤, 郭志坤主编)

ISBN 978-7-208-12626-8

I. ①夏… II. ①郭… III. ①中国历史—夏代—通俗
读物 IV. ①K2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364号

总 策 划: 郭志坤

策 划: 上海文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监 制: 王兴康 朱锦川

出版统筹: 孙瑜

责任编辑: 张钰翰

美术编辑: 傅惟本

电脑制作: 郭剑华

地图绘制: 陈伟庆

地图审图号: GS(2014)1228号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

李学勤 郭志坤 主编

夏 史

郭 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25 插页 5 字数 254,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26-8/K·2291

定价 48.00元

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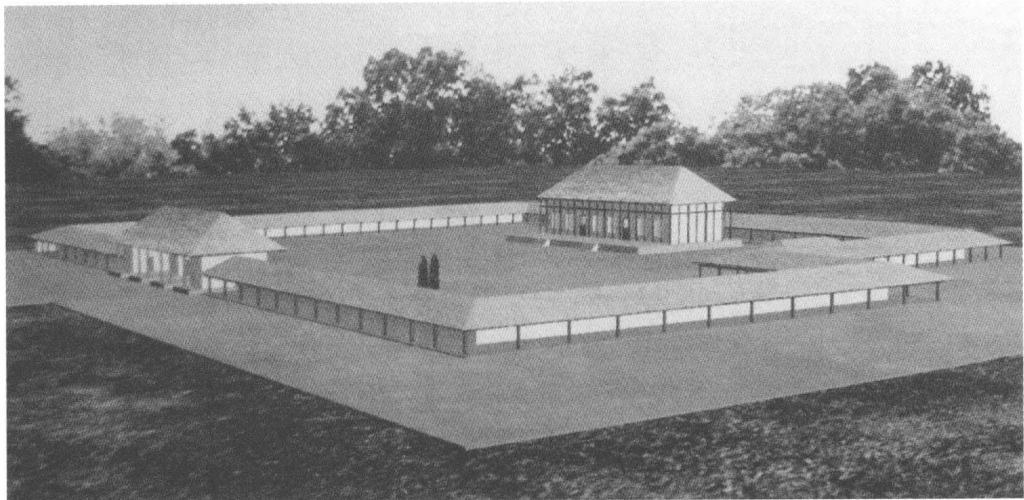
导 语

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这样一段经典式的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认为，这一表述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它粗线条勾勒出了文化中国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矢志于“通古今之变”，开创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中华史学传统。嗣后的两千余年间，史著汗牛充栋，记述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也难。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以来三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还较易梳理，而对更前面的夏代以及先夏期的历史，则长期浮游在是真实的信史、还是飘渺的传说之间，难以让人定夺。就拿夏代来说吧，大圣人孔夫子一面说“夏礼吾能言之”，一面又慨叹于“文献不足征也”。说白了，单凭现存的那些被太史公称为“不雅驯”的文献资料，要想叩开早已逝去的上古文明的大门，简直是不可能的。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一种文明一旦产生，即使再久远，它也会在后人的记忆库中留下某种若隐若现的印记，这就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由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更为重要的是，“昨天”和“前天”的文明，虽说它会由于某种难以解读的缘由而会在地平线上消逝，但它往往会在大地的深层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旦人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除掉厚厚的历史尘埃，就能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近百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包括近年来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让沉睡在地底下数千年的先人“起死回生”，重新站立到历史的前台来诉说当年的史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迷惘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复原图（引自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偃师二里头一带，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当这里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耒、耜、凿、斨、锥、钻等“先进”农业工具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还会怀疑一个进入农耕社会期的夏代的存在。当这里出土的铜片和铜鼎、铜爵、铜觚、铜斝、铜盃、铜铃、铜泡和其他铜饰品，以及使用了合范法浇铸的铜范等物放在人们的面前时，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对“禹铸九鼎”的传说产生怀疑。当总面积有一万余平方米的被世人誉为“华夏第一都”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掘出来后，也很少有人还会对夏代文明的领跑地位提出质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不只给夏代是否存在的争议打上一个大大的历史休止符号，同时使更多的人们对夏王朝之前的先夏文明，对五帝时期的历史，对更古远的六千年、七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

本书作者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华夏王朝，实现了“天下一统”。这个王朝绵延了四百多年，它影响了中国整部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这个王朝虽说早已成为历史，可直到当今，世界各国还是称中国人为“华夏人”，简称“华人”。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对“夏”与“华”的最为经典的解读。“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孔颖达说的“礼仪之大”。中国



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之邦”的“大”起于何时呢？很明确，就起于夏代。无怪乎在二里头发掘中有那么多的礼器了。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实际上在向我们说明：夏代是开创了礼仪之邦先河的了不起的时代，中国和世界记住这个王朝的缘由也在于此吧！

实际上，孔圣人早已点明了中华礼仪之邦是发轫于夏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说的“因”，就是继承。孔子是在说：殷朝的礼仪是从夏朝那里继承



二里头“华夏第一王都”碑

来的，周朝的礼仪是从殷朝那里继承来的，有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百世”以后的中华礼仪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孔子到当今，差不多“百世”（中国传统称三十年为一世，百世为三千年）了，可我们不少的中华人，甚至史学工作者，还不知“礼仪之邦”的“根”在哪里呢！

“礼”之发轫于夏代，以宏阔的视野观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万“邦”（原始氏族公社）林立到整合万邦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阶级社会，夏“国”亟需有一套制度、手段、象征来凝聚邦国，如此，结合当时风俗习惯而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

研究夏史有许多事要做，但我们以为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指出“夏礼”在整个礼仪之邦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应该是一个中心议题。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是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的具体行为。因此，它渗透于农耕农事，渗透于住宅和宫廷建筑，渗透于慎终追远的祭祀，渗透于新兴的传子制度，也渗透于人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这些都是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研究的。我们这部《夏史》要表达的新意也在于此吧！



目 录

序 一	李学勤	1
序 二	郭志坤	3
导 语		1

第一章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

第一节 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1
第二节 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7
第三节 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14
第四节 作为“百里之诸侯”的先夏族		18
第五节 先夏史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		22

第二章 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鲧

第一节 旷日持久的洪水大泛滥		26
第二节 鲧的治水业绩		32
第三节 鲧的个性及悲剧结局		35

第三章 大禹：“三代”第一王

第一节 “三过家门而不入”		40
---------------------	--	----



第二节	治水十三年功成	45
第三节	“唯禹之功为大”	50
第四节	成为“三代”第一王	56

第四章 禹定九州和铸九鼎

第一节	天下九州的划分	59
第二节	禹贡制度	64
第三节	禹铸“九鼎”和王权建设	66
第四节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71

第五章 夏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	76
第二节	传子制度的确立	83
第三节	夏启艰难的建国历程	85
第四节	“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90

第六章 夏王朝的兴盛

第一节	太康失国和“五子之歌”	93
第二节	后羿代夏	96
第三节	少康流亡中的砥砺	99
第四节	“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102

第七章 夏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孔甲“乱夏”	106
第二节	“武伤百姓”的夏桀	110
第三节	商汤代夏	113



第八章 夏王朝的权威

第一节	“王”字内涵的变迁	119
第二节	王城——夏王朝权威的旗帜	123
第三节	“夏后氏官百”	130
第四节	宽严相济的夏代法制	133

第九章 夏朝划时代的文明进步

第一节	新时代和新文明	138
第二节	历法时代	142
第三节	青铜时代	147
第四节	玉石时代	152

第十章 为礼仪之邦奠基的夏礼

第一节	夏礼和中华传统礼仪	157
第二节	“始诸饮食”的夏礼	162
第三节	夏礼的基石：孝礼	166
第四节	“以天下养”的养老思想	171
第五节	“慎终追远不忘祖”	174

第十一章 夏代民生掠影

第一节	养民“九功”	177
第二节	“邑”和“邑人”	179
第三节	邑人的食谱	182
第四节	尚黑右衽的夏装	185
第五节	“开道”与“筑梁”	188



第十二章 典籍中的夏代

第一节	《诗》《书》等典籍中的夏代	190
第二节	先秦诸子对夏代的追记	194
第三节	司马迁的考察报告《夏本纪》	198

第十三章 二里头遗址昭示的夏代文明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205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分布地区	210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昭示的夏代文明	215

附 录

附录一	夏大事记	219
附录二	夏代世系表	221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222
	夏时期中心区域图	224

结束语	226
-----	-------	-----



第一章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

第一节 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一万年，对人类，尤其对已经在神州大地生息、繁衍了几百万年的中华人来说，是一个吉祥如意的数字。

万年陶、万年居、万年稻、万年猪、万年货、万年祭……这些与“万年”相关联的厚重的名词，都在告诉世人：在地球的东方，早在一万年前，中华人就迈开了向文明进发的第一步。

万年陶。

江西省有个万年县，万年县有个大源镇，大源镇郊外的一座小山巅上有个宽敞而深邃的仙人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进入了神秘的仙人洞，在洞中采集到了两百余块古朴的陶器残片。经碳 14 测定，不得了，这是一万年前我们祖先制作出来的陶器的残片。专家们将其命名为“华夏第一陶”。之后，考古学家又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苏溧水县神仙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同样古老的陶器残片。



被称为“华夏第一陶”的陶罐（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

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创造发明，出现在华夏大地那么广袤的幅员里，这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一万年前，世代居处生息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华人，取一方净土，制作出了中国——不，也许是世界上的第一件陶器。中国被世人称为“陶瓷王国”，现在看来其起点就在大约一万年前。

万年陶，这是人类第一件真正称得上是创造的大事。历史因这一创造而显得分

外的精彩。正如恩格斯所说，“陶”的发明，使先民一下脱离了稚嫩的蒙昧时期，进入了野蛮时代。^①陶品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语”和人类的“通用语”。万年陶让世界认识了中华，同时又让中华走向了世界。

万年居。

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而猿是居住在树上的，最初的人类也是居住在树上的。中华神话和古典文献中说的“有巢氏”，实际上是对人类婴儿期生活的依稀追忆。后来，地球上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剧变，大批森林消失，于是，人类走向陆地，在严酷的自然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下，不得已住进了洞穴。

以洞穴为家，人类一住就是几百万年，占据了整部人类居住史的99.99%。

然而，洞穴绝非人类永远的洞天福地，洞穴的阴冷、潮湿，极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考古资料表明，穴居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岁左右，不少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洞穴绝不是久居之地，走出洞穴、走向大地是早晚的事。

大约在一万年之前，中华人终于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出现了长期定居的村落。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八九千年的“半地穴”建筑。先民们在地面比较坚实的地方挖上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坑，将地面夯实，再铺上点小石子，四壁用火烧烤，使之“陶”化，然后在坑上的地面盖上屋面。如此低矮的半地面半洞穴建筑可是人类的一大创造啊，它既可防止风雨的侵袭，又可享受阳光。万年居让华夏人享受到了更多的光明，也让人类开阔了视野。

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一幢幢民居开始升起在华夏大地的地平线上。从半坡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姜寨遗址（今陕西省临潼县城北），人们可以约略

